

<<大气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气候>>

13位ISBN编号：9787224088205

10位ISBN编号：722408820X

出版时间：2009-3-1

出版时间：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昌平

页数：29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一直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李昌平同志，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在农村基层工作，但仍然把下农村基层搞调查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李昌平同志对农村有调查，有了解，而他又善于思考，所看、所思、所想后，就一定要说话，一定要发言。

他要说的话，就形成了一本书。

书稿出版前，他送给我，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不是农村问题专家，应当说，对农村问题没有研究。

但是，60多年的经历，使我逐渐形成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党只有解决好了农村问题，我们国家的经济才能发展得好，社会才能安定。

从建国60年的历史来看，1949年至1955年，我们党的农村政策使农村在一场大的战乱后，迅速地恢复了元气。

而到了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1956年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我们就开始逐步地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

到了1958年，我们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搞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那时，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

应当说，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对农民欠债了。

人民公社存在的25年间，前后两次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第一次大灾难表现为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和正常出生率的锐减。

第二次大灾难表现为“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农业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内容概要

《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充分涵盖了三农问题的各大主要方面，包括农村改革三十年的回顾，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道路，新农村土地制度建设，新农村治理制度建设，新农村金融建设，粮食与农产品安全问题，话语体系沟通，扶贫方式探讨等，结合三鹿奶粉事件、猪肉价格飙升等最新事件，以及三中全会文件、中央一号文件等最新政策，为您展现一个特殊视角下的中国农村。

《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充分发挥李昌平先生在三农问题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鼓励和支持一种有别于政府、学者、官员、个体农民的独立声音，为各界研究者和基层干部提供一个优秀的读本。

三中全会后，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度飙升，而李昌平既有农村工作的实际经验，又有研究者的理性思考和高度，兼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同类书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唯一性。

作者简介

李昌平，男，汉族。
湖北监利县人。
1963年4月20日出生。

已婚。

中共党员。

经济学硕士。

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顾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1983年——2000年先后任湖北省监利县周河公社团委书记，监利县周河乡、周沟乡、柘木乡、棋盘乡党委书记、监利县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务；1989年7月，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1997年9月，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获硕士学位；2000年3月上书朱总理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得到政治局常委集体的高度重视，引发湖北等地农村改革；同年9月辞职南下广东打工；同年10月，在国内首次公开呼吁“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因此评为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任务；2002年元月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三农”问题由此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1年9月—2003年10月，就职于中国改革杂志社，任记者、编辑、执行主编、农村版副主编，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其间著作《我向百姓说实话》；2003年10月至今，就职于香港乐施会，任西南项目官员、乐施会中国部顾问，兼朝鲜项目高级专员；2006年7月至今，受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2003 - 2008年，有专著《中国农村状况》在日本、越南出版；在国内外发表文章数百篇。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回首30年——我们有最好的农民一、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说起二、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三、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四、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第二章 新农村建设的大气候一、纵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表象、阻力与突破口三、海峡两岸，农业发展比较四、寄托于资本家的农民增收梦，该醒了！五、“菲律宾道路”走不得第三章 土地制度的变迁与展望一、地根经济与地根政治二、扩大农民地权及其制度建设三、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之优越性——与越南之比较四、土地重要，但不是首要问题五、“一分就富”“一分就绿”的林改神话第四章 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出路一、乡镇体制的变迁与重建二、乡村治理的困境三、农民组织化的政治意义四、村民委员会的改革与创新五、乡镇干部与乡镇改革第五章 新农村新金融一、建设新农村，先建新金融二、农民合作互助金融发展现状与对策三、为农民的金融权利辩护四、试验和启示第六章 粮食与农产品安全一、粮食与农产品安全的现状与意义二、国际粮价飙升，我国或大有机会三、农民愿种粮，总理才不慌四、猪肉涨价该如何“宏观调控”五、农产品（食品）安全与农民组织第七章 生活之树常青，政策之树常青一、让农民成为“三农”政策的决策主体二、开发式扶贫模式该检讨了三、假如给我2万亿四、给我200亿，也行！第八章 几篇扶贫日记一、崇敬和回报穷人的美德二、有这样一个医疗合作社三、百年石门坎跋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回首30年——我们有最好的农民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的17位农民，“分田单干”，不推自广，开启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波澜壮阔的30年。

对于这30年当中，农村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30年农村改革，是农民不断创新的30年，是农民不断奉献的30年，是农民经历巨大变迁的30年，是农民忧喜交加的30年……30年，中国农民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但没有改变的是，农民，依然还是那个农民。

一、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说起我的第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在2001年底出版，正好赶上“三农”工作被提升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了总揽全局的头等大事。

这几年，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的含金量有了很大提高，基层干部和群众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也迈出了很大步伐。

我们惊喜地看到，严峻的“三农”问题的确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经常有人问我，对这几年中央“三农”政策和基层的改革实践怎么评价？

我给大家讲几个《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没有收录的“改革故事”，这些都是我过去在基层工作时，亲历亲为的“改革故事”。

也许从这些“改革故事”中，能够找到解读现在的“三农”政策和改革实践的角度。

故事一：休克疗法“休克疗法”这个词是俄罗斯人创造的。

俄罗斯人搞“休克疗法”的时候，我也在搞“休克疗法”。

1993年，我出任湖北省监利县周沟乡书记，此时，我正值“三十而立”之年。

周沟乡地处监利县的水陆交通要道，是一个分别由分盐和黄歇两个大镇划出一块地盘而组建的新乡。建乡以来，乡干部间派系矛盾重重，工作难以开展，经济发展也严重滞后，穷得发不出工资，甚至乡干部们不得不在危房里办公。

正因为周沟乡是个“野猪林”：所以，才让我这个最年轻的书记捡了个“便宜”。

当书记后，我请求县委配了一个比我小的年轻人做乡长，作为我的搭档。

我们两个人都年轻气盛，决定要“不计后果”地大干一场。

俗话说得好，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决定从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抓起。

周沟乡的优势是交通便利，是农产品加工和集散的好地方。

制约周沟乡经济发展的不是客观条件，而是政府和部门干部“太狠”——卡、拿、O（吃喝）、K（玩乐）太厉害。

乡干部和乡管的部门比较好办，我们将十几个办公室合并成五个办公室，将农业类的几个站所合并到农业办公室，将党务和群团系统合并成精神文明办公室，将党委和政府办公室合并成党政办公室，将财政、经管和政府财贸办公室合并成财经和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将城建和企管会等合并成发展委员会，这五个办公室的主任和副主任由党政副职领导兼任。

难办的，是工商、税务、土地、财政、城管、派出所、司法所、环卫所等十多个具有收费收税权力，且直属县、局管理的“执法”部门。

我们决定用智慧“限制”这些偏好“寻租”的“执法”部门。

1993年底，我们秘密完成了一项调查，查清了企业主一年的上缴税费和隐性负担之间的比例，为1：2以上，也初步掌握了一些执法人员违纪违法“寻租”的证据。

1994年正月初八，我和几位乡党政班子成员在乡政府设宴，给县直管部门、乡五大办公室、乡直企业领导和私营企业主拜年。

席间，我逐一问及各个部门当年的税费任务情况。

所长们都讲，主管局下达任务增长太快，任务重，难以完成。

我现场做了一下统计，所有任务不足200万元。

对所长们的抱怨，我表示了深深的“同情”。

早有准备的乡长，及时抛出了乡政府统筹完成税费任务的设想。

<<大气候>>

这个设想很简单，就是各个部门的税费任务由政府分解，下达各个纳税主体——下达税费任务“明白卡”，纳税主体按照“明白卡”按月缴纳税费，年内业务增长不加负担，业务显著萎缩减负，乡政府财政兜底。

在乡政府设纳税（费）大厅，每个部门每月只需派一人参加两天的集中办公，每月24日为税费集中缴纳日，再由乡政府在2日将所缴纳的税费划拨到各个站所的账户或代为上缴到主管局的账户。

每月欠收的部分，由乡财政垫付资金上缴。

中途新办的企业，所增收的“计划外”税费，放在政府专户上由政府集中管理，转入下年。

政府对部门的要求也很简单——各个部门都不准进企业收税费，仅各出一人，组建一支“公平交易执法队”，专施打击欺行霸市和不诚信交易者之职。

如果企业平时需要部门服务，也可以在纳税（费）大厅集中办公完成。

这个设想，在场的企业主是求之不得，部门站长、所长也都觉得很省事。

有几个部门站长、所长（事先安排的“托”）还提出要当场和乡政府签协议，也有企业主愿意当场缴纳全年税费任务。

于是，我们当天就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形成了文字依据，所有参加会议的部门站长、所长及纳税（费）主体都和乡长签了协议书和保证书，我这个党委书记做了“公证人”。

这项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非常明显。

企业主再也不用每月花很多的时间陪形形色色的“执法”人员吃喝玩乐了，欺行霸市有人管了，农产品加工和集散很快活跃起来。

当年就有福建、湖南等地的商人在周沟集镇上投资办厂，当年新增计划外税（利）30多万元。

1993年，周沟乡是全县经济最落后、财政最穷的乡镇，到1996年，周沟乡却成为监利县农产品加工和集散的主要基地，在全县26个乡镇中，财政状况进入了前五名，各项工作都名列前茅。

但这样的改革不是没有阻力的，“执法”者的灰色收入减少了，县主管局总感觉自己的执法主体地位被削弱了，还担心其他乡镇向周沟乡学习，于是千方百计地想废除“周沟实验”。

在1996年的一次全县乡镇党委书记和科局长会议上，一些科局长在会议上集体发难，指责周沟乡党委和政府剥夺了各管理部门的执法权力，要求县委和县政府纠正周沟乡党委、政府的违法“改革创新”。

面对科局长们的集体发难，我以“猫论”和“实践检验论”为“周沟实验”辩护，并建议县委和县政府推广“周沟经验”，促进监利经济发展。

本来双方可以打个平手的，但有两个副县长站出来为科局长们说话，并说省市两级的厅局领导也对他们施加了压力，请县委主要领导以监利大局为重，纠正周沟乡的“违法改革”，以改善监利县和省市厅局的关系。

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我以“只要我在周沟一天，‘周沟实验’就不会改变；哪个科局要改变，我就送你们的站长、所长进监狱”相抗争。

在这样的对峙下，县上领导和稀泥：“周沟的改革实验继续，其他乡镇不要效仿。

昌平不可能长期在周沟工作，等昌平离开周沟后再议。

”1996年12月，我由周沟乡党委书记调任柘木乡党委书记。

一个月后，周沟乡回到了原来的管理状态，有多个企业主找我诉苦：“每天都觉得自己像犯罪分子。

”原来，“以禽蛋加工厂为例，有17家部门收税费，每月，一家只要去一次，业主至少要有17天陪‘执法’人员，吃好玩好了，交了钱，就是守法经营，否则，就违法了，就是‘犯罪分子’待遇。

农产品加工企业，各种税费（按最高标准统计）总计要占销售收入的50%以上，如果依法足额上缴各种税费，没有不亏本的，所以，企业主们每天都感觉自己就是犯罪分子”。

我离开周沟不到一年，福建、湖南等地投资者逃之夭夭，两年不到，周沟的财政状况沦为全县倒数五名之列。

我将“周沟模式”称为局部经济起死回生的“休克疗法”，可惜人走政息！

故事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996年12月，我由周沟乡党委书记调任柘木乡党委书记，这是我第三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也是最有挑战性的一次。

此时，柘木乡面临三大难题，一是当年遭受了大洪水，全乡各级组织基本瘫痪，全乡60%以上的人民

<<大气候>>

群众等待救济不得而四处逃荒；二是乡干部严重超编和财务管理混乱，导致乡级财政赤字1200万元，大半年没有给干部和教师开工资，干部和教师们普遍悲观失望；三是水毁工程恢复和重建任务繁重，必须在1997年4月前全面完成工程任务，确保人民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用一年的时间帮助乡长理顺柘木乡的各项工作，组织上就将对我另有任用。

这是县主要领导给我的承诺。

要突破柘木这样的困局和乱局，没有丝毫退缩的余地，只能迎难而上，勇往直前。

必须集中全乡人力、物力、财力，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水毁工程。

我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干部带头。

因为我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是一条真理。

越是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候，人心反而越容易凝聚，关键看干部。

这就像放鸭子和放羊，发挥了领头鸭子和领头羊的作用，混乱的鸭群和羊群自然就会变得有秩序。

我的措施是，命令全乡所有干部（包括部门干部、职工和教师）都必须带头完成和农民同等定额的水毁工程任务，此外还要承担组织领导工作。

所有的干部、教师、部门职工，都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工地上，并且起得更早，睡得更晚，更加劳累。

干部被“强制”表现出的“表率”作用，感动了柘木乡的人民群众，仅用了两个月，全乡共完成了20多万立方米土建工程，同时发放“以工代赈”的粮食40多万斤。

在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之后，迅速转入精简机构和人员的战役中。

通过清理编制和人员，需要一次性清退编外人员121人，这是比完成水毁工程任务更加艰难的任务。

我采取了如下步骤。

第一步，向乡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乡政府财政的收入、支出、负债的真实状况和机构人员编制状况，由大会讨论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对策。

大会作出的首条决策，就是精简机构和清退编外人员。

第二步，将清退编外人员的具体方案向县委和县政府报告，获得县委、县政府批准柘木乡清退编外人员的批复，进一步确定清退编外人员的合法性；同时，组织靠得住的财务审计专班，清理乡和区（管理区）两级财务，解剖财务危机的原因，并掌握各类干部违反财经纪律的情况。

后记

这是我在国内出版的关于农民的第三本书。

我一直告诫自己，为农民写书，写农民能读懂的书，写没有废话的书。

当我最后一遍改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这本书的有些话语或词汇会让农民，甚至基层干部也看不太懂。

我不得不承认，在城市里和主流话语打了八年交道，已经被主流话语“污染”了。

为此，我深感不安，甚至有道德上的负罪感。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不停地到处跑，做与农民相关的事，说与农民相关的话，写与农民相关的文字。

一是可以混饭吃。

做别的也是混饭吃。

对我而言，混与农民相关的饭吃可能相对容易一些。

二是想为农民说话，为农民争取权利，为农民争取好生活。

因为，我爹我娘、我家世代都是农民，我自己虽然在北京生活八年了，每年缴的税也不比市长少，但也是一个“农民工”。

为农民就是为我自己，就是为我爹我娘，就是做孝子。

这样想，对自己有好处，赋予了生活的意义，不觉得人生无聊了。

所以，思考农民的前途，已经是我生活意义的最重要部分。

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农民的出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

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远的不说，近的就亚洲“四小龙”。

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近乎是“普世真理”。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书中所弥漫的那种对国家饱含责任感的情怀，依然让我很感动；他对农村问题的思考，也可以引起诸多农村问题专家的关注。

尤其在国家致力于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正需要更多的情况调查和建议，作为政策的参照。

——杜导正 李昌平是经济学硕士，在农村基层一线工作了17年，来《改革》杂志任记者、编辑后，仍不断下乡调查研究，在丰富的实践体会的基础上，拓宽了宏观的视野，自然会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尽管有些观点、判断、剖析，尚不无可商榷之处，但都可引人深思，使人得益。

——吴象 李昌平的文章在中国是独一份儿，别人替代不了。

书斋里的学者，读再多的书，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基层官员不读书，不研究，也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

——丁东 昌平提出了新集体主义，值得反思

和参考。

他的书来自田间村头，叩问民心所向，质疑制度设计，为农民呐喊，为农民争权益。

“三农”问题是国家重中之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应该一读。

——孙大午

编辑推荐

《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作者李昌平先生近年来对三农问题持续关注研究,从一名基层工作者逐渐转型到研究者、社会活动家。

在坚持基层工作的同时,文章的写作也从不懈怠,数量大,涉及广,速度快,积累有近百万字的评论性文章,以实例加分析的方式,提出了大量具独创性和前瞻性的见解。

其文章不但具有代农民说话、从基层事实出发的亲和力,也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整体适应性,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强烈个人风格,举全国上下,竟一时无两。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